

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



巴蜀书社

XUZHONGSHU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JINIANWENJI

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 周伯谦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 字数 60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 册

ISBN7-80523-935-5/Z·102 定价 43 元

2000. 9. 29

四川大学历史系

李永宪 先生

赠 阅

目 录

七律一首	马 曜 (1)
古文字学与先秦史学	斯维至 (2)
深切缅怀徐中舒先生	郦家驹、洪廷彦 (6)
徐中舒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和特点述略	张勋燎 (9)
徐老和民族史研究	冉光荣 (15)
立德立言、归于不朽	王 辉 (19)
卜辞中的危方与兴方	饶宗颐 (22)
卜辞“侑祀”考	常正光 (27)
甲骨文字新解(二则)	张亚初 (32)
说甲骨卜辞中的“湄日”	杨升南 (38)
“翌”的时间所指	常玉芝 (43)
卜辞同文例研究举例	蔡哲茂 (48)
说卜辞中的延尸	曹锦炎 (54)
释离	何琳仪 (57)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祭祀中的“尸”和“祝”	连劭名 (61)
非王“劣体类”卜辞	黄天树 (66)
释卜辞中的“兕风”和“虚风”	沈建华 (70)
释甲骨文灵字及相关的青铜器纹饰	詹鄞鑫 (73)
甲骨契刻与汉字形态的规整化	刘志基 (77)
试论殷墟时期上帝观念的发展	王德智 (81)
关于子组卜辞材料问题	常耀华 (86)
古器中的虎食人造型及穷奇见于商代卜辞考	何 靖 (90)
铎伯庆鼎续释	李学勤 (98)
晋侯邦父墓出土有铭铜器及相关问题	刘启益 (101)
金文的“命”	赵 诚 (104)
宋代著录楚公逆钟铭文补释	曾宪通 (108)
正薛三例	伍仕谦 (112)
晋侯稣钟铭文的刻制与西周用铁问题	李朝远 (116)

新见“发孙虘鼎”及“郾凡伯怡父鼎”小记	张光裕 (122)
说初吉	彭 林 (128)
春秋齐侯孟与鞶匭铭文对读	冯 时 (133)
公作敌簋及其二、三史事	夏麦陵 (137)
《四年昌国庖鼎》考	陈 平 (142)
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	彭裕商 (147)
谈谈晋侯苏钟历日的有关问题	方述鑫 (151)
地下书与告地策·遣策新论证	黄盛璋 (155)
尖首刀铭文释地	黄锡全 (163)
赵二十九年相邦赵豹戈补考	吴振武 (170)
包山楚简中的“枳”	李家浩 (173)
帛书黄帝五正考释	魏启鹏 (176)
读《甲骨文字典》兼论甲骨文具书之编纂	陈炜湛 (180)
说蔡	何琳仪、黄德宽 (187)
释《尚书》中的“格”字	臧克和 (191)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 1045 年再考	赵光贤 (195)
苗、新、畚为三年连作说	吴荣曹 (198)
皋陶及相关问题	孟世凯 (202)
周人北来说	沈长云 (205)
《易传》：儒家第一座理论框架	洪家义 (209)
“窃国者为诸侯”小议	罗世烈 (213)
段干木新传	缪文远 (216)
周景王铸大钱考辨	姚 政 (219)
《汉书·世经》校读记	张闻玉 (224)
西周主体农业生产者试探	彭邦炯 (229)
周人始祖应是不窋	李仲立 (238)
“魏惠王欲让国于惠子”辨	江玉祥 (242)
关于春秋时期大夫邑宰问题的探讨	段志洪 (246)
论殷代外服制和西周分封制	段 渝 (252)
孔子与春秋时期的尚文之风	罗新慧 (260)
从考古发现谈夏、商前期年代学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杨育彬 (264)
周原凤雏宗庙基址考	陈复澄、林小安 (269)
晋侯墓地与夏墟、唐风、晋都	江林昌 (275)

试说巴蜀	许倬云 (280)
从石崇拜看大禹与羌族的关系	李绍明 (284)
蜀夏同源新论	林 向 (290)
古蜀国鱼凫世钩沉	高大伦 (299)
早期蜀史诸代的并存、相继关系及其共主秩序考略	彭邦本 (303)
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 (未定稿)	徐亮工 (307)
编后记	(379)

七 律 一 首

六书新说史无前，砥柱西南五十年。
义寓于声戈训小，耕原自猎井从田。
人师风范垂当世，众望归仁裕后贤。
志学立身思母教，静安一贯有薪传。

徐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后学 马曜

戊寅年十月

古文字学与先秦史学

——为纪念中舒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斯维至

徐中舒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先秦史学家。回忆抗战时期，我辗转流亡到了成都，受蒙文通、徐中舒两位先生的教诲和启迪，学习先秦文献和古文字学等，终于摸索着走上先秦社会历史的研究道路。

蒙先生把经学作为历史哲学研究先秦、两汉、宋代等断代史，兼通佛学理学，所以更是一位思想家。徐先生受业于王国维之门。王国维不以经学相标榜，他用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与先秦文献互相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但使《史记·殷本纪》记载的世系得以证实，而且使过去认为是神话传说的《山海经》、《楚辞·天问》等书成为有用的史料。他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两重证法”。徐先生不但精通古文字学，而且以古文字学为线索贯通先秦历史（包括史前史）、社会、民族文化等，广泛地应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新材料，从而扩大“两重证法”为“多重证法”。

今年为徐先生的百年诞辰，因此我只谈古文字与先秦史学作为纪念。对蒙先生将另文纪念。

（一）由铜器器形到图象、花纹的研究

在史语所期间，因利用考古材料比较方便，徐先生主要以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他不但考释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器形，乃作《说尊彝》、《论古铜器之鉴别》、《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等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先生对于图象的注意。如《古代狩猎图象考》就是根据铜器上的图象以推知古代的狩猎和作战的情况的，后来先生对于汉砖汉瓦石刻也予以同样的注意和研究。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都受到其影响，并且更有发展。

（二）由工具到牲畜的使用，以研究当时之生产方式及社会文化

“五四”以后，西方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始传入我国。徐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晚于西方史学，但他却是我国最早注意农具、工具、兵器于历史研究的。他的《耒耜考》作于1930年。耒和耜原是我国石器时代以来的两种农业工具，一直沿袭到青铜器时代还在使用，到铁器时代逐渐合而为一，因此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徐先生自己也说“虽是一、二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

不但这样,徐先生还由农具的使用注意到动物、牲畜的使用,如他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即其一例。此文可与其《古代狩猎图象考》并看。徐先生于前文中不但证明我国古人使用动物于农业,而且由象之南迁说明南北气候之变迁。但他认为牛耕在我国要较晚,甚至要到战国以后。此说也许还可商榷,不过他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徐先生从来尊重实物史料而不轻信假说。他的《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发表于1951年,可惜我至今尚未读到。又他同年还写过一篇《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可能徐先生认为“牛耕”也由东亚通过秦与匈奴传入。

抗战期间,徐先生连续发表《结绳遗俗考》、《古井杂谈》、《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显而易见,徐先生已由生产方式转向生活方式,即社会文化之研究。(编者注:斯先生此说不确。《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发表于1950年,《古井杂谈》则发表于1977年。)

(三) 古代社会组织及社会形态之研究

1944年徐先生发表《井田制度探源》一文,这大概是他由研究社会文化进而研究土地制度的开始。不过在这篇文章中他只研究井田制度的起源尚未及于土地制度本身。他由井字田字象中间设有木栏及陷阱之形,因此认为是初民的围猎,后来初民的战争所以采取包围方式可能也是仿效围猎而发展起来的。这确是有初民社会的调查材料作根据的(如女真族就是如此),并且可以由古文字井、田及陈(即阵字)字作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先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读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玛尔克》等文,乃作《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当时国内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我国古代社会分期及性质问题,所以徐先生也有这篇文章。初发表于川大的《学报》,但是他的观点立刻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苏联史学界也为之介绍。徐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提到井田制类似日尔曼人的玛尔克,即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爰田”、“辕田”即玛尔克(公社)的轮耕换种。

之后,徐先生陆续发表了许多篇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分期与性质的文章。1978年,文革才结束,徐先生发表了《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我国西南及沿海的少数民族中至解放前还存在着村社共同体,即所谓洞。他对云南的民族工作者马曜等认为西双版纳的傣族的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予以热情的支持。

在这期间,热闹过一阵的社会分期讨论却突然消沉了,所谓“五朵红花”也逐渐萎谢。但是徐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写过《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则有《巴蜀文化初论》及《续论》。在五十年代,徐、蒙两先生都致力于巴蜀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各持不同的观点,其原因是徐先生侧重考古材料,而蒙先生侧重文献材料。还有这时间由于经济建设,我国各地都有铜器的发掘出土,因此他连续写了《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四川彭县濠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觶》、《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铎》、《西周利簋铭文笺释》等等。

还应补充提到,早在30年代徐先生所写的《殷周文化之蠡测》及《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两文,他已经悟到我国古代东西民族两种文化的来源。但是由于当时史前考古的材料还很有限,多推揣之论,而80年代由于郑州二里头夏遗址的发现,徐先生对过去推测仰韶文

化即夏文化之可能性，不得不自己推翻，因此作《夏史初曙》一文。由此可见徐先生科学的求真态度。

（四）古文字的综结及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甲骨文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有文字而后有历史记载。《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话因此获得实证。

由于甲骨文字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被发现，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人的辛勤搜集、印行，才被世人所注意。嗣经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人的考释分类研究，不但其字可以认识，而且可以考定其年代、内容及其占卜的方法、意义，殷商的思维与概念。20年代以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连续进行科学发掘13次，直至抗战发生才被迫停止。建国以后，又继续进行多次发掘，除出土甲骨文外，还有大批铜器、陶器以及陵寝遗址、祭祀人殉场所等等，于是由甲骨文字研究发展为甲骨学。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王国维曾经利用甲骨卜辞以研究殷商历史社会，从而提出“两重证法”。由于甲骨文乃我国最早的文字，因此文字学家又与许慎的《说文解字》比较研究文字的起源及其结构——造字的方法与原始思维——概念的形成。徐先生晚年特别致力于古文字学之研究，他集合一些年青人共同完成《汉语大字典》及《甲骨文字典》两大巨著。

徐先生认为最初文字为象形文字，而后有指事与形声字；会意、转注、假借乃形与义的结合，假借犹今人所谓别字。王力作《同源字典》由音义而求其同源，徐先生则由形义而求其同源，可谓“异曲同工”。因此这两部书，不但是文字的工具书，而且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我早年向徐先生学甲骨文，并不是在课堂里听徐先生的讲课，而主要是阅读徐先生的著作，学习他怎样应用古文字去解说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

今年是徐先生的百年诞辰，又适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召开，这是20世纪到21世纪伟大历史转变之际，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及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由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毛泽东思想又转变为邓小平理论。虽然它们的转变是有其一贯性的，但是也有其变异性。中舒先生的一生恰好经历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两个社会。他的古文字研究和先秦社会的研究标志着他的新启蒙思想，即新文化运动思想。

“五四”运动，相当于欧洲十八、九世纪的新启蒙思想。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引起农业和工商业的突飞猛进。人文科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五四”运动之际，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深感中国的积弱、贫困、落后都因封建主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帝国主义乘机掠夺和奴役中国，但是它们的科学技术（坚甲利兵）、经济管理仍旧是值得学习的。戊戌变法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就因此流行起来。“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认识到西学——科学思想与人文科学以及政治经济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同样值得学习。当时马克思主义也由俄国、日本传入中国，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作为革命的对象，认为非一手反对封建主义，一手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同时进行不可。西方启蒙思想只反对封

建主义，而不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受启蒙思想（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属于启蒙思想）的启发。

1949年全国解放，从此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跳跃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生产力仍很落后，封建生产关系也依然存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承认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实际就是要补足缺少资本主义的课程；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就是要科学与民主。因此邓小平理论，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他的发展。那么新启蒙思想、新文化运动仍有“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自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各种运动都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不免失之过火，实际就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邓小平同志竭尽全力，拨乱反正，以纳入正确的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5年之间，我国的经济建设思想文化迅速得到恢复和繁荣。这次十五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特别又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是因为物质文明的效果已经显而易见，但精神文明的效果还不能相应地跟上。因为精神文明决非短时间或者搞一个突击式的活动就能奏效的。我们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科学与民主精神。但求“速效”，重视物质刺激，而忽略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上行下效的道德教育、历史教育，是短视的。

蒙、徐两位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研究，而无赫赫之功；循循善诱，莘莘学子无不受其感化。我虽然成绩甚微，但是永远不忘两先生的教导和启迪作用。古人重视立德、立言，不亚于立功。21世纪为和平发展时期，精神文明更胜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发达，物质文明往往容易流于庸俗、奢侈、腐化，这是中外历史教训可以证明的。

1997年9月22日于陕西师大

深切缅怀徐中舒先生

郦家驹 洪延彦

1943年秋至1946年夏，我们肄业于四川大学史地系。当时，成都是内地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学术界许多著名人士云集于此。川大和挤在华西坝的几所教会大学，教授们可以互相兼课，在川大讲课的教授盛极一时。我们有幸亲聆蒙文通、钱穆、丁山、黄文弼、束世澂、肖公权等先生的教益；而授课最多的是徐中舒先生。

现在史学界有些朋友往往只知道徐先生是对先秦史和古文字学造诣极深、有很多创见的前辈，而不知他曾经也对明清史下过很大的功夫。这大概是由于徐先生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先秦史研究之故。回顾几十年前，我们学了两个学期中国通史之后，为我们讲中国上古史的是束先生；徐先生开的两门课却是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到了三年级上学期，抗日战争刚胜利，开学不到两个月，丁山先生急于回安徽处理家务，他讲授的中国古文字学由徐先生接着讲下去。两个月的课，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使徐先生欲罢不能。寒假后，他应全班同学的请求，增开了“殷周史”。

无论开什么课，徐先生备课都非常认真。他总是先拟好提纲，列出要点，编成讲义，内容充实而线索清晰，其间包含他自己许多专题研究的独创见解和前人以及当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获得宝贵的知识，还可从中领略研究问题的途径。尽管当年的笔记历经迁徙和“文革”，早已荡然无存，但其梗概，还会不时在脑海中浮现。

徐老早年整理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摸过大量的原始资料，熟知明清两代兴盛衰亡的史实和典章制度的变革，有自己深切的感受，非一般只参考各家通史、断代史本子而遽登讲坛者所能企及。他又经常注意学术界新发表的论著，吸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的讲稿，前辈如孟森，同辈如谢国桢、罗尔纲，年轻学者如吴晗，都是他一再提到的。

明清史和近代史都是一学年的课程，但时间并不充裕。老师着重讲了政治史，而又从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分析其因果关系，在他的讲义中，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代的川楚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以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占了很大比重；对明清两代官制和兵制的介绍，也比较系统。在详细论述帝国主义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史实时，表情严肃，虽然少用激昂慷慨的言词，也足以使我们听了以后义愤填膺。

古文字学这门课，丁山先生实际只概述了甲骨学的历史和甲骨、金文对古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徐先生接着讲古代文字的源流。他以甲骨、金文对比《说文》，举例说明《说文》哪

些讲得好、哪些讲得不确或不完全正确，反复强调研究古文字要以《说文》为基础，而又不受它的束缚，必须熟悉先秦以及汉代的文献，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正确解释每个字的本义及其流变。他解释“六书”非常明白易懂，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字，都举了好些例子，在黑板上写出甲骨文、金文和篆文，当时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能记得。和明清史研究一样，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充分肯定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的贡献，经常提到《观堂集林》、《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著，而他治学最可贵的精神，却在于不固守旧说，不断地推陈出新。他对自己原来的解释，往往在继续探索中改立新说。如关于𡳿字的本义，他当年释作独木梯，说：“双脚爬梯上去为陟，下来为降”；1950年发表《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改释为竖穴侧壁之脚窝，认为“双足循脚窝上升为陟，下来为降”，引用考古资料与古文字相印证，确实更有说服力。

殷周史是一个学期的课，因时间的限制，只讲了若干专题。他首先介绍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如何运用“二重证据法”深入研究殷周史，然后讲述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独创性研究成果。1945年之前发表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和《井田制度探原》等，他都亲自详细讲授了。这些论文之富有卓识，史学界早有评论，在此毋须赘言。

我们深知：中舒先生取得学术上这么高的成就极不容易。中舒师青年时期就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并在攻读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除了个人勤奋好学外，还得具备较好的客观条件。难怪有些青年同志在谈到中舒师时，竟认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较为富裕的家庭。说实在，如果不是老师亲口对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从童年到青年“备极人世凄凉”的身世。

1945年12月中旬，中舒师因老母去世，异常悲痛。我们和李世平、周兆祥前去吊唁，老师囑分两班轮流笔录他口述的老人一生行谊。他一边讲，一边哭，又不时哽咽。当我们知道他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两年后由母亲带着他在清节堂生活，后来又在清节堂附设的小学勤奋学习，以及如何在安庆师范毕业后历任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才能迎接在清节堂日夜纺织20年的母亲回家等等之后，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不仅对这位刚逝世的老人由衷地肃然起敬，当然也更加敬重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勤奋求学的中舒师。几天之后，中舒师把所撰《先母事略》印发给参加殡葬仪式的朋友和学生。我们迄今还珍藏着这篇用土纸印的文章，凡借阅它的年轻同志，都说读了之后非常感动，起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

吴天墀先生《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说：徐先生“艰难的身世，从孩提之时起，不断经历磨砺和锻炼，养成朴实谦逊的作风”。朴实谦逊，不但表现于治学和教育工作上，还表现在待人接物上，这是他的朋友和学生尽人皆知的。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年金陵大学在邻近川大的地方盖了一片简陋的教职员宿舍，屋顶是茅草，墙壁又是外涂泥巴、石灰的竹片。有一天晚上突然起火。中舒师急忙率领我们一群学生去参加救灾，将好几位教授家的家具、衣箱搬到安全地带。这是徐老帮助别人解除急难的典型事例。

我们是江浙人，1946年夏，结伴离蓉东归。中舒师曾经劝我们不要走，再三说：“只差

一年就毕业了，眼前交通秩序还是很乱，何必这么急呢？”他尽管认为我们有点不听话，但还是欣然同意到图书馆门前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我们进复旦借读后，写信告诉他，他在给周谷城先生去信时表示对我们的学业很关心。后来他还为我们写过介绍信，让我们就近向一些前辈请教。

40 多年来，相隔数千里，我们时时惦念老师，老师也没有忘记我们。好几次在北京见面，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的 1979 年 3 月在成都见面，看到先生身体健康，非常高兴。先生乘全国史学规划会在蓉开会之机，宴请他的同辈朋友，把我们也拉了去。我们深感没有努力做出较好的成绩，在席上当众表示了辜负先生教诲的抱愧的心情，先生只是莞尔一笑。80 年代我们先后到成都拜谒先生，虽然觉得先生显得十分衰老，然而喜见先生主持的研究室济济多士，成绩斐然，实在为之欣慰。

现在，先生的墓木已拱，而先生之教泽永存。遥望西蜀，缅怀不已。

徐中舒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 贡献和学术特点述略

张勋燎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徐中舒先生作系主任期间在五十年代末和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共同创办起来的。1978年我国恢复博士学位制度，由于冯先生已于1977年去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就以徐先生的名义获准成为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他在担任先秦史博士生导师的同时，还担任了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直至1991年辞世。徐老之学，博大精深，作为一代大师，虽然研究的重点是古文字学和先秦史，但在考古学方面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有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徐、冯之学，建立了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我作为徐老的学生，从1953年进入川大历史系学习，毕业后按照徐先生的安排担任考古学教学科研工作，除读书期间亲聆徐老授课、指导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而外，工作期间接触的机会也不少。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兹就个人对徐老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和治学特点的认识，略呈浅见。

徐先生研究考古，范围甚广，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的各种遗物遗迹在内，自30年代初以至80年代，先后发表过《耒耜考》(1930)^①、《再论小屯与仰韶》(1931)^②、《古代狩猎图象考》(1932)^③、《屈氏编钟图释》(1932)^④、《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1932)^⑤、《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50)^⑥、《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觶》(1962)^⑦、《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錡于》(1974)^⑧、《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1983)^⑨……等论著多种。纵观诸作，通过考古材料的研究以复原古代社会历史，这是徐先生治考古学的指导思想。而以器物类型学方法和古文献材料相结合，运用多方面的相关知识研究考古材料，则是他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徐老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是，要通过地下出土实物遗存来认识古代的社会历史，观点鲜明，这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先生有关考古学之论著，无论专文或零星论说，无不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原则。如《再论小屯与仰韶》研究发掘仰韶文化遗存材料以探索殷商之前的社会历史，像这样的例子自不用说。他如著名的《耒耜考》宏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就当时能够见到的有关古代实物（包括器物上的图象和铭文）进行考察，“从一两件农具上面探农业演进的消息。”在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82年开办《农业考古》杂志时，徐先生的这篇文章仍被视为农业考古的经典之作重行发表在创刊号上。在以后发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徐先生又根据解放后在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新发现的耒耜实物和使用的痕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他原来的观点，说历史上后来的“木耒当来源于

河姆渡的骨耒，而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骨‘耜’，颇似战国的方足布和尖足布。古代布币，就是古代农具的仿制品”。从而把我国使用耒耜农业的历史上推到了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最近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耒耜材料，也给徐先生的观点增加了更多的证据，使之更加光彩夺目。1932年发表的《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虽然可供研究的考古材料只是一个墓葬出土的寥寥五件随葬品和一些带有少数铭文的墓砖，经过徐先生的研究，却从铜盂（洗）制作之粗劣和两件无釉瓷器的发现，看出“汉晋以来，以铁器与漆器之代兴，致铜器日趋衰歇”、“铜器衰歇之后，陶瓷亦渐次发达”。六七十年以前，科学发掘之事甚少，“关于唐代以前之陶瓷吾人所知，尚极贫乏。此当涂晋代之陶瓷，在古陶瓷学上，亦为重要之发现。”在文中并进一步指出：“当涂地滨大江，故寿州之白陶，亦由水道直接抵此，其铜制盘盂之形制，又与中原无殊，则其所受中原文化之影响，盖已达于成熟之阶段。建康为六朝旧都，与此相去不过百里，其文化当亦相同。由此可见当孙氏据有江东及晋人东迁时，即依此种文化以为建国之基础。假使当时东南文化去中原过远，则孙吴及六朝决不能建国于此，故此类遗物之发现，在古代文献上尤为为重要”。凡此种种，皆根据考古发现实物史料以复原古代社会历史，揭出考古材料之深刻意义，而不停留于考古材料外部形态之描述与排比，可谓得考古之真谛。

器物类型学之方法，系从考古材料之形制现象进行观察比较，整理出发展演变之序列，以为判定器物年代之依据，探索史迹发展规律之起点，这在今日已为学人所共知。但在30年代我国近代考古学处于草创时期，学界对此一般尚无认识。徐老在30年代初发表的若干考古论著中，率先提出明确概念，并付诸实践而为精密之研究，为学界树立了典范。他在1932年发表的《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中说：“遗物年代之判定，为一切问题之核心”。《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中说：“铜器年代之判定，为研究铜器最先决之问题”。“中国铜器有千余年之历史，在每个时代中，虽各有其特殊现象，然其自身之演化应自成一系统”。《屈氏编钟图释》一书中更明确讲道：

“中国学者对于铜器，向来唯重视其文字，至于器物之形制与纹饰则殊漠然……今日照相印刷术又大为发达，出版铜器之书有图象文字可资参考者亦近二十余器，其形制纹样三者有可以确定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数器。如能先以此为断代之标准器，再由此标准器之形制纹样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辗转推求，则铜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断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后再求其形制纹样文字与时地相互演进之关系。于此铜器之研究，或有系统可寻。此《屈氏编钟图释》则期欲于此方面树一例证也。

该书研究本世纪初传为河南巩县出土之编钟一套14枚，就钟之类属、形制、纹饰、文字、年代、国别加以综合考察，谓“钟饰以细密而连续之虬虺龙纹样，其枚上（即钟乳）纽上，更以绳纹及满状刻纹配饰之，此与殷周以来所盛行之蟠螭云雷凤纹等图案，迥然不同。盖铜器铸作，至此，显然已入于一新时期中”。复参以其他诸方面之特点，判为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三家分晋前之晋（韩）器。迄今视之，大抵不误。而《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用了近10万言的篇幅，以断代为中心，系统研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八件镶嵌狩猎纹铜壶的器物名称、形制、纹饰、铭文、工艺、用途、用法、国别和所反映的种种历史问题，提出了“狄氏壶之款识”、“新郑归化及淮南出土之铜器”、“穿鼻兽环之耳饰”、“白色之镶嵌”、“铜

器内面鳃鱼龟形之浮雕”、“猎图中所绘戈形”、“带状物质”、“羽人飞兽之翼形”等8项器物特征比较材料作为判定年代的标准，断为春秋战国至汉初遗物，矫正了过去学术界将之笼统称为“秦器”的含混说法。在8项断代标准中，除器形材料而外，有铭文器物仅有一件，而每器皆有繁复之纹饰，故属单纯纹饰方面的就占了6项，纹饰变化序列，实为研究之重点。而这6种标准纹饰，又系经过对数十种不同纹饰的精密考察之后筛选出来的。在今天看来，两件断为西汉器可能与实际情况稍有出入，但只占少数，其余6器判为春秋战国遗物，完全是可靠的。其准确程度之高，足证其方法之科学及运用之擅场。正如50年代末有人在《考古》发表评论所说，在我国铜器研究发展史上，最早注意从纹饰方面考察其发展演变者，“徐中舒先生的《古代狩猎图象考》才是系统研究某类花纹的著作”^①。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我国铜器研究史上影响深远的划时代之作。该书最早在昭和七年（1932）出版于日本，书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序言中虽然也原则性地讲到了先秦铜器“整理之方法，……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年代之推定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界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以器铭与花纹、器形为标准，整理出先秦铜器发展之序列，与上述徐中舒先生所论相同，该书自序于1931年9月，创说大抵同时。然《大系》初版本上、下编，仅就251器铭文作断代考释研究，除书前附13器之铭文拓本图版而外，其余218器铭文拓本俱无，全书正文实未涉及据器形、纹饰判定铜器年代发展序列之具体研究，是其方法论原则尚未进入具体运用之阶段。其后经过1935年，1957年两度增定，始将此理论付诸实施，建立起两周铜器发展之序列体系。两相对照，徐先生的《图释》与《图象考》二著，在我国先秦铜器研究史上器物类型学方法论及具体运用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也是不可磨灭的。

以器形、纹饰、铭文为标准判定考古发现材料年代方法之运用，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不仅限于先秦铜器，亦见之于秦汉以后之遗迹。如《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研究无纪年文字之晚期古墓遗存，于“年代之判定”部分，即明确提出“据铜盂上所铸龙之图绘，铭文，及甃文用字之区别，以为严密断代之标准”，将此种过去被断为“汉器”的材料改判为晋代遗物。其准确无误，已为后来大量科学发掘材料（包括纪年墓葬及器物）所证实。文中广为收集年代明确之带龙形图象古物材料，分析龙形变化之时代特征以为断代之标准说：

“今所存汉以来龙之图绘，如铜镜，墓壁，刻石所载，有扁长之巨吻，四足长尾，首戴两角，前足旁或著翼形（当时画仙人均作翼）。……此种作风自汉至晋，大致无甚变更。如由图绘之形体上求其蜕变之迹，则此盂上所铸龙形，张口吐舌，或即为断定年代上一最显著之特征。

罗振玉《古镜图录》卷中所载莽镜有四，……其龙形均不吐舌。乐浪出土永平十二年（西元69年）漆盘，绘两龙张口，仍不吐舌。御斋藏山东两城山刻石，其龙始作吐舌形。两城山刻石成于永建七年（西元113年），是此种作风当起于西元64—112年之间。浣池五瑞图，为建宁四年（西元171年）刻石，其时代已在两城山之后，龙亦作吐舌形。

此吐舌作风，当后汉末或魏晋之际尤为发达。朝鲜大同江方面出之金错简，其图绘